

## 地区政治透析

中东国家建构中的少数族群问题<sup>\*</sup>

张燕军

摘 要：中东地区民族、宗教状况极为复杂，这导致几乎所有中东国家都存在着大量少数族群，如何处理与少数族群的关系，是影响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主要以埃及科普特人为例，阐明少数族群与主体民族间关系的演变及他们如何在中东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被边缘化。此外，本文还讨论了中东国家对待少数族群的政策性失误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本文认为政策及执行的公平性是确保中东国家各族群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唯一出路。

关 键 词：少数族群；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科普特人

作者简介：张燕军，博士，咸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陕西咸阳 712000）。

文章编号：1673-5161（2014）03-0076-20 中图分类号：D562 文献标识码：A

<sup>\*</sup>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陕西省社科基金“民族国家构建与中东国家政治稳定研究（编号13H040）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与中东国家政治稳定研究”（编号2013M532013）的阶段性成果。

中东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其文化的多样性，也使其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多族群聚集，交错分布和共同生活的地区。在今天的中东，没有一个国家是单一民族国家，少数族群都占有相当的比例，绝对数量更是可观。少数族群的大量存在，是困扰现代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它给中东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

## 一、中东国家少数民族概况

“族群”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文化概念，指基于共同文化认同（包括语言、宗教、习俗等）而形成的一个群体，这种群体既可能是民族性群体，也可能是宗教性群体。“族群”与“民族”的区别在于族群是一个文化范畴、民族则是一个政治范畴。“族群”（ethnic）有很多与“民族”（nation）相同的含义，但是却没有自治实体的含义。与主体民族相比，少数民族往往没能实现政治主权或得到合理公正的对待，这导致他们有着更强烈的政治诉求，中东国家民族构建的失误和迟缓加剧了其政治诉求的暴力化，这反过来又严重影响了中东国家的稳定，加大了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难度。中东国家少数民族很多，而且上述两种类型的族群都有广泛分布。造成这种族群呈马赛克状分布的重要历史情境是“一个由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政府决定将置于其统治之下的各个异族合并为一个民族，而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除此之外，在这个过程中帝国主义国家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进行逐一分析，全面考察这一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客观条件。

首先要澄清两个问题，第一，中东地区所谓的“少数民族”是一个相对概念，这个概念主要适用于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分析，例如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众所周知，阿拉伯人是中东第一大民族，绝非少数民族。但在以色列国内，阿拉伯人就成为少数民族，不仅是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本文使用的“少数民族”概念也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分析，在此首先予以说明。第二，所谓的“民族国家构建”包括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两个层面，“民族构建”指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也即一个具有共同国家认同的“政治民族”的形成过程，“国家构建”指实现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合理化、制度化的进程。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都是一种动态的历史进程，没有止境，始终处在演进之中。

中东民族国家构建始终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在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两个层面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东国家长期的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

[英]斯蒂夫·芬顿著，劳焕强译：《族性》，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 （一）民族性族群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库尔德人、柏柏尔人、阿塞拜疆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等。

库尔德人。作为中东地区第四大民族和历史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库尔德人问题非常具有典型性，所以我们首先以库尔德人为例来分析。库尔德人的起源一直是一个极具争议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现代库尔德人的起源可追溯至米堤亚人（Medes），他们是一个源自中亚的印欧部落，公元前 614 年左右进入伊朗高原。此后，他们相继经历了阿拉伯人、蒙古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一战中，库尔德人参与了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协约国也做出了战后允许其建国的承诺。但在一战结束后，库尔德人成为大国分赃的牺牲品，库尔德人居住的领土被瓜分，就此，库尔德人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无国家民族”，他们也就此踏上了寻求独立建国的漫漫征途。

今天的库尔德人主要聚居在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但在叙利亚和前苏联也有相当数量的库尔德人社区，目前还没有关于中东库尔德人总人数的可信数字，库尔德方面有时声称其数量在 3500~4000 万之间，这可能是一个夸大的估计，库尔德领导人的目的在于借此强调他们的政治要求，而同样出于政治考虑，本地区相关国家则总是倾向于低估本国的库尔德人数量。

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是当今中东人口最多、分布最广泛的民族，但这是就整体而言，具体到个别国家，阿拉伯人也成为了少数族群（民族），例如在以色列、伊朗、土耳其等国。下面我们就以以色列为例来分析作为少数族群（巴勒斯坦人）或称之为少数民族的阿拉伯人。1949 年初，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签订停战协议，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进入了第一个历史时期，当时其犹太人口为 65 万，阿拉伯人 15.6 万，他们都自动成为以色列公民，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成为和犹太人共同生活的最大的非犹太人少数族群。但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尤其是其中的穆斯林对以色列国家缺乏内心真正的认同。以色列是属于犹太人的民族国家，但这个国家五分之一的人口却是阿拉伯人。在以色列，阿拉伯人是一个少数民族，因为以色列政治、经济和军事精英主要是犹太人，阿拉伯人的社会地位与其所占人口比例极不相称，同占据优势地位的

---

Nader Entessar, *Kurdish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0, p.3.

Nader Entessar, *Kurdish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p.3.

Arye Rattner, Gideon Fishman, *Justice for All?: Jews and Arabs in the Israeli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1998, p.8.

犹太人相比，他们感觉到被歧视。

作为少数民族，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呈现出三个特点：首先，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往往集中居住。截至 2003 年，大约 46% 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居住在以色列北部地区（加利利地区），他们占这一地区总人口的 52%，形成了对犹太人的微弱优势，其余大部分以色列阿拉伯人则居住在耶路撒冷和海法。目前阿拉伯人大多（73.1%）生活在加利利和海法两个地区，13.2% 生活在以色列中部和特拉维夫，11.3% 生活在南部，1.7% 生活在耶路撒冷附近。在以色列还形成了纯粹的阿拉伯城市，使阿以两大民族处于事实上的隔离状态。以色列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隔离以及阿拉伯人的二等公民地位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多重消极影响，两个民族共处一个国家但却以一种被定义为传统多元主义的方式相互分离。其次，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以耶路撒冷为例，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出生率远高于犹太人，其平均出生率为千分之三十，而犹太人为千分之二十五点四。与此同时，耶路撒冷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自然增长率（出生数量与死亡数量的差异）也远高于犹太人（27.4/1000：20.3/1000）。所有因素综合在一起，可以看到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的增长率几乎是犹太人的 3 倍，过去四十年中，犹太人增加了 146%，然而同一时期阿拉伯人增长了 280%。第三，即使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内部也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以色列阿拉伯人是一个具有多种文化特质的少数民族，其中穆斯林占 77%，基督徒占 13%，德鲁兹人占 10%。

## （二）宗教性族群

---

M. Amara, Abd Al-Rahman Mar'i,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The Arab Minority in Israel*,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p.23.

Sonia Archer-Capuzzo, *Common Ground: Promoting Communication and Fostering Trust Among Israel Arabs and Jews Through Music*, Ann Arbor, Proquest LLC, 2008, p.16.

M. Amara, Abd Al-Rahman Mar'i,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The Arab Minority in Israel*, p.23.

Arye Rattner, Gideon Fishman, *Justice for All?: Jews and Arabs in the Israeli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p.8.

Yael Gold, *Demography, geopolitics, and the future of Israel's capital: Jerusalem's Proposed Master Plan*, Jerusalem Center Public Affairs, 2010, p.13.

Yael Gold, *Demography, geopolitics, and the future of Israel's capital: Jerusalem's Proposed Master Plan*, p.14.

Yael Gold, *Demography, geopolitics, and the future of Israel's capital: Jerusalem's Proposed Master Plan*, p.14.

M. Amara, Abd Al-Rahman Mar'i,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The Arab Minority in Israel*, p.23.

宗教性族群是中东国家内部少数民族的另一组成部分，在当代中东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是影响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因素。它们包括：属于伊斯兰教的什叶派、阿拉维派、德鲁兹派，属于基督教的科普特教派、马龙派、东正教、罗马天主教等。

伊斯兰教什叶派。什叶派是伊斯兰教世界最大的非主流派别，目前占世界穆斯林的人数的 10~15% 之间，当然也有观点认为，由于什叶派“塔基亚”原则的影响，该派人数实际被低估，如维基百科就认为什叶派占全球穆斯林的比例应在 30~35% 之间。作为仅次于逊尼派的伊斯兰教第二大教派，什叶派在中东国家均有分布，尤以“新月地带”和波斯湾地区最为集中，在伊朗、伊拉克占有优势。什叶派与逊尼派间的恩怨已绵延了一千多年，时至今日，非但没有缓和的迹象，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作为少数派，什叶派在历史上一直受到逊尼派的压制和迫害，但什叶派的抗争从未停止过，其强烈的政治诉求性千年如一，两者间的斗争构成了伊斯兰教史和中东地区历史的重要内容。在今天，作为少数民族，什叶派依然是影响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因素。

基督教马龙派。马龙派在公元 5 世纪初由叙利亚传教士马龙所创，该派承认 451 年卡尔西顿公会议决议，坚持基督一位两性论，即：基督具有真实的神性和真实的人性，但只有一个位格，该派在 7 世纪形成教会，7 世纪后半叶，在倭马亚王朝统治时期，马龙派断绝了和君士坦丁堡教廷的联系，开始独立发展。公元 11 世纪末开始的十字军东征，使马龙派建立了和罗马教廷的联系，16 世纪，马龙派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宗教领袖地位。目前，全世界的马龙派教徒约 400 万人，主要分布在黎巴嫩、美国、叙利亚、塞浦路斯、澳大利亚、加拿大及西欧国家等，其中黎巴嫩国内约有 100 万人，占黎总人口的 1/4 左右，是黎巴嫩最主要的宗教社团之一，也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基督教群体之一。

基督教科普特派。科普特教派 (Coptic Church) 属于基督教东部教会的分支，是最古老的基督教派别之一。科普特教派是中东最大的基督教群体，他们主要聚居在埃及，据估计，科普特人占埃及总人口的比例在 10~20% 之间。另根据最新调查，保守估计科普特教徒至少占埃及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在

---

James Jupp, *The Australian People: An Encyclopedia of the Nation, Its People and Their Origi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74.

Anthony O'Mahony, Emma Loosley, *Eastern Christianity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bingdon,

埃及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并实现伊斯兰化以后，他们以缴纳人头税的方式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从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埃及到1952年埃及革命爆发，科普特人享受着相对的自由平等，其政治权利与其所占的人口比例相称。但在埃及步入纳赛尔时代后，受主体民族主义和国族构建的影响，科普特人的社会地位呈下降趋势并延续至今。

目前埃及科普特人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居住集中，主要分布在上埃及以及开罗、亚历山大等大城市。60%以上的科普特人聚居在上埃及，其中一半以上分布在 Assuyt 和 Minya 两省——科普特人的故乡，也是宗教冲突非常激烈的地区。其二，科普特人的世俗化水平较高，尤其表现在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远高于埃及的穆斯林。总体而言，在20世纪，科普特人在高等教育界所占比例大大超过了他们的人口比例，其文化水平较高而犯罪率较低。其三，埃及科普特人口有减少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艰难的处境和日益恶化的形势所致，在过去二十年中，科普特人成为埃及人才外流的重要一部分。阿拉伯之春后，埃及穆斯林与科普特人的冲突不断升级，加速了这一趋势。

## 二、少数民族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

在反抗帝国主义者入侵和早期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中东国家的少数民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之后，他们在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逐步被边缘化，其政治空间和文化空间被压缩，与主体族群的矛盾日渐升级，两者间关系日益恶化，导致中东民族国家构建进程步履维艰、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 （一）少数民族与早期中东民族国家构建

在反抗帝国主义入侵和殖民统治，追求民族国家独立和革命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积极参与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下面我们仍以埃及科普特人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英国占领埃及后，对科普特人来说有一点非常清楚，作为埃及的占领者，

---

Routledge, 2010, p.61.

Anthony O'Mahony, Emma Loosley, *Eastern Christianity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p.61.

Anthony McDermott, *Egypt from Nasser to Mubarak: A Flawed Revolution*, Abingdon, Routledge, 2013, pp.185-186.

Anthony McDermott, *Egypt from Nasser to Mubarak: A Flawed Revolution*, p.186.

英国为了赢取穆斯林的支持，其政策要压缩科普特人的空间，当英国人免去科普特人担任的许多重要职务时，这项政策的目的更加暴露无遗，关键岗位代表性的被削减在科普特人中引发了更强烈的反英情绪，这甚至超越了对被占领的愤怒，这促使科普特人与穆斯林联合，在“埃及是所有人的埃及”的口号下参与终结外国占领的斗争。

在华夫脱党运动（Wafd）兴起后，科普特人又开始与穆斯林合作，参与争取真正实现埃及独立的民族民主运动。科普特人一直怀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埃及是所有人的埃及”，在穆斯塔法·卡米尔及后来的塞得·扎格鲁尔的民族主义情绪鼓舞下，科普特人和穆斯林基于共同目的联合起来反对英国统治。应当指出，一些最杰出的科普特人积极参与了华夫脱党。在华夫脱党内部，科普特人占有相当比例，虽然在 1920 年代初，华夫脱党担心科普特人在党内的巨大影响可能会伤害自己，但华夫脱党的宣传仍然极力强调团结统一，它甚至公开宣称“埃及是一个独特和统一的种族，享有共同的生理和心理特征”。

许多年中，华夫脱党由一位著名的穆斯林纳哈斯帕夏和一位科普特人马克拉姆“即乌贝都拉帕夏”共同领导民族主义运动；1922 年，埃及宣布独立，1924 年 1 月，扎格鲁尔组建内阁，其中包括两位科普特人：莫克斯·哈纳担任公共工程部长，瓦瑟夫·加利出任外长，显示了当时埃及社会的团结。事实上，华夫脱党历次胜选执政期间，科普特人的代表权都能得到保证。平心而论，在其执政时期，在安排更多科普特人出任高级官职方面，华夫脱党比其他任何政党做得都多。

但在和谐的表象之下，埃及社会暗流涌动，影响科普特人与穆斯林关系的隐患依然存在。华夫脱党是当时埃及唯一主张捍卫科普特人政治参与权和推动科普特人发挥其影响的政党，这也导致反对派攻击华夫脱党是科普特集

---

Martyn Thomas, Adly A. Youssef, *Copts in Egypt: A Christian Minority Under Sieg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6, p.37.

Otto Friedrich August Meinardus, *Two Thousand Years of Coptic Christianity*,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99, p.76.

Otto Friedrich August Meinardus, *Two Thousand Years of Coptic Christianity*, p.76.

Irmgard Schrand, Irmgard M. Sterner, *Jews In Egypt: Communists And Citizens*, Berlin, Lit-Verlag, 2004, p.31.

Otto Friedrich August Meinardus, *Two Thousand Years of Coptic Christianity*, p.76.

团，当马克拉姆成为华夫脱党秘书长时，纳哈斯被形容成他的木偶，反对派声称埃及已被交到了科普特人手中。这给之后科普特人与穆斯林间的关系恶化以及科普特人在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的被边缘化埋下了伏笔。

### （二）少数民族在中东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的边缘化

虽然在中东民族国家的初建时期，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关系大都经历了一段蜜月期，但随着民族国家构建的深入进行，主体民族主义和国族创建运动日渐深入，在这种情势下，少数民族的权利逐渐被漠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空间被压缩，他们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被边缘化。具体表现在：

首先，他们逐步淡出权力中心或成为陪衬。在埃及，无论是纳赛尔、萨达特还是穆巴拉克，都会在内阁中任命一位科普特人部长，这成为埃及政治的一种惯例，也成为各族群政治平等的一种象征。其次，在经济上因受土改、国有化运动和政策歧视的影响，他们的财富和工作机会遭受巨大损失，例如在穆巴拉克时期，教育背景较穆斯林良好的科普特人，不允许担任大学校长和报纸杂志主编职务。其三，在文化上，中东国家还有意淡化少数民族的民族特征和历史，压缩其文化空间，例如土耳其就不承认库尔德人的存在，将其称之为“山地土耳其人”，不允许库尔德人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和庆祝民族节日。

### （三）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

少数民族在中东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的边缘化不仅侵犯了少数民族的应有权利，更重要的是加深了族群间的矛盾和隔阂，一旦国家出现政治不稳定，少数民族往往会受到指责，成为政治替罪羊和受害者，二战后的中东历史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少数民族在中东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被边缘化有一个不太引人注目但却影响深远的后果，就是促进了少数民族（尤指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这对中东国家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持久的潜在威胁。我们再以科普特人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早在华夫脱党运动时期，由于与穆斯林的分歧，科普特人的民族认同意识开始产生，他们意识到自己与穆斯林在身份、信仰、利益要求等方面的差别，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萌芽。

---

Irmgard Schrand, Irmgard M. Sterner, *Jews In Egypt: Communists And Citizens*, Berlin, Lit-Verlag, 2004, p.32.



华夫脱党运动是一场持续时间较短但意义深远的运动，这是七世纪以来科普特人第一次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民族主义感情，也是首次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爱国斗争中扮演决定意义的角色。由于 20 世纪以后，埃及科普特人的大量移民，使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等地都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科普特社区，他们对埃及科普特人命运的关注也在推动着科普特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

### 1、海外的“远距离民族主义”

远距离民族主义 (Long-Distance Nationalism, 也称“长程民族主义”) 或称之为海外民族主义 (Diaspora nationalism) 指产生于海外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虽然出现在海外，但与本民族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对本土民族同胞的命运充满着关注。“远距离民族主义”是科普特人民族主义的一种类型，它形成于北美地区，尤其是美国，对埃及国内科普特民族主义的发展和埃及—美国关系有着重要影响。

北美、欧洲、澳大利亚等地科普特人社区的形成归因于 1952 年以后埃及形势的变化。首先是埃及革命胜利后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运动，这使相对富裕的科普特人受到严重经济打击，促使科普特人离开埃及；另外，美国 1965 年移民法的重大修改与埃及的政治混乱几乎同时发生，由于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埃及面临着经济危机和政治骚乱，纳赛尔总统领导的政府合法性受到沉重打击，美埃两国这些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共同促成了科普特人对美移民的大幅增加。

从 20 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世界各地的科普特移民开始上升，特别是北美、澳大利亚和西欧，科普特人虽然离开了他们的祖国，但他们没有离开他们的教堂、传统和与故乡的联系。进入 21 世纪后，由于埃及不明确的政治前景和对未来的失望，对科普特人而言唯一的选择就是收拾行装离开，给基督教在埃及两千年的历史划上一个句号，现在，一股新的科普特人移民浪潮已经开始并正在蔓延，他们大部分涌向此前几十年他们的同胞已经定居的国家：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

Otto Friedrich August Meinardus, *Two Thousand Years of Coptic Christianity*, p.76.

Eliot Dickinson, *Copts in Michigan*,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954.

Mat Immerzeel, Jacques van der Vliet, *Coptic studies on the threshold of a new millennium*, Leuven, Peeters Publishers, 2004, p.989.

Samuel Tadros, *Motherland Lost: The Egyptian and Coptic Quest for Modernity*,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13.

海外远距离民族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通过新闻媒介介绍和宣扬科普特文化。以加拿大科普特人为例，1968年科普特教会创立了加拿大科普特人协会，其目标是团结科普特人、保护传统文化并让加拿大公众了解它，该组织的第一项活动是创办了双月刊《加拿大科普特人协会》，它以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三种文字出版，主要关注科普特人的历史、语言、文化。除加拿大外，美国、澳大利亚等地也都有科普特人的杂志。在表达民族主义情绪方面，埃及的科普特人杂志根本无法与北美相提并论，一份《科普特人：埃及的基督徒》刊物发表大量体现海外科普特人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文章，该杂志也是科普特人就人权和宗教事务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论坛。其二，通过游说活动影响西方国家与埃及政权的关系。这也是科普特人远距离民族主义的重要表达方式，随着美国科普特人数量不断上升，这种游说活动的力度和影响也在增强。下面我们对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美国科普特人口的增长趋势进行分析。根据1970年美国的人口调查，当时生活在美国的埃及移民共有31358人，其中约有25000人是科普特人，到七十年代后期，科普特领导人估计美国科普特人数量在8.5万~10万之间，到1989年，总人数增加到16~18万之间，根据2000年美国人口调查和全国宗教协会的数据，美国约有100座科普特东正教堂，拥有约30万成员，规模最大的科普特社区集中在美国的大都会，例如纽约、波士顿、洛杉矶、芝加哥、底特律、休斯敦和克利夫兰。

美国的科普特人在科普特人与穆斯林关系高度紧张时离开埃及，他们反对科普特教会领导层与穆巴拉克政权和解，因为他们认为穆巴拉克支持反对基督教的极端主义，他们成立组织通过游说美国立法者的方式反对穆巴拉克政权。而科普特人在美国这种集中聚居于大都会城市的特点、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对祖国科普特同胞命运的关心使他们积极投身于美国的政治生活，希望借此对埃及政府施加影响，改善埃及科普特人境遇、维护其权益，在这种背景下，游说成为美国科普特人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

---

Paul R. Magocs, *Encyclopedia of Canada's Peopl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corporated, 1999, p.458.

Nabeel Abraham, Andrew Shryock, *Arab Detroit: From Margin to Mainstream*,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31.

Eliot Dickinson, *Copts in Michigan*, East Lansing, p.1942.

Ronald H. Bayor, *Multicultural America: An Encyclopedia of the Newest Americans*, Santa Barbara, ABC-CLIO, LLC, 2011, p.602.

## 2、本土民族主义

埃及本土科普特民族主义思潮的历史极为悠久，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即已出现。圣·谢努达是科普特民族主义运动史上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也是事实上的科普特民族主义之父，他是一位来自索哈杰的僧侣，他代表了埃及基督教的激进派，基于促进科普特民族主义和主权，他反对亚历山大神学与安提约希亚神学（即叙利亚天主教教会）之间的任何和解，今天谢努达神父的名字已成为科普特民族主义的象征，他的名字经常被那些关注科普特属性和坚持科普特人是一个独特民族的人所使用。谢努达神父被后世的科普特教会封为圣人，即圣·谢努达，在之后的科普特教会史上，多位教皇采用了“谢努达”这个名字，如谢努达一世（859~880）、谢努达二世（1032~1046）以及刚刚去世的谢努达三世（1923~2012）。

圣·谢努达代表的古代科普特民族主义在之后中世纪漫长的岁月中虽然备受磨难，但科普特人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和独特属性，在埃及被阿拉伯—伊斯兰化后，即使要缴纳沉重的人头税，科普特人依然执著于信念。19世纪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现代科普特民族主义诞生，在与穆斯林的分歧面前，科普特人开始认识到两者间的巨大鸿沟并不会因为暂时的共同斗争目标而弥合，这促使科普特人开始更加深刻地思考自身的前途命运。古代科普特民族主义与现代科普特民族主义的区别体现在多方面，首先，古代科普特民族主义的诞生是因为基督教内部分歧，具体来说，是东部教会各教派间的分歧，即亚历山大教派与叙利亚天主教会间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科普特人第一次明确了自我意识，认识到自身的独特性，为以后现代科普特民族主义的产生做了思想铺垫；其次，作为一种少数民族民族主义，现代科普特民族主义是中东民族解放运动和主体民族主义的副产品，它在民族解放大潮的挟裹下萌芽，在主体民族主义和国族创建运动的挤压下诞生；其三，现代科普特民族主义属于文化民族主义，它强调宗教文化的多元共存。

与海外民族主义一样，埃及国内的科普特人表达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渠道也是新闻媒体。如在埃及有几家报纸和其他出版物以各种方式推动着科普特民族主义的发展和科普特人的利益保护，其中最著名的是 al-Watan。另外，新兴的通信手段也被科普特人广泛使用，如博客、Facebook、Twitter 等，这

---

Elizabeth Iskander, *Sectarian Conflict in Egypt: Coptic Media,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Abi ngdon, Routledge, 2012, p.14.

Nabeel Abraham, Andrew Shryock, *Arab Detroit: From Margin to Mainstream*, 2000, p.231.

些方便快捷的工具既有助于科普特人内部交流，又能以最快的速度向外界发布信息，让世界了解科普特人的动态，在科普特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地位日益重要。

### 3、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思潮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

少数民族民族主义的产生对中东民族国家构建有着重大影响，因为民族国家构建意味着一国领土范围内的所有公民要确立对国家的认同，消除或至少是弱化对次国家行为体的忠诚，培养公民意识、树立公民身份，尊重少数民族的集体政治权益，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族际政治整合，将其纳入民族国家构建进程。而少数民族民族主义的产生则是对这一过程的背离，同民族与国家的融合趋势背道而驰，是民族国家构建的反作用力。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越强烈、越极端，它带给民族国家构建的挑战也就越大。因为中东国家与欧洲不同，欧洲已基本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融合，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合为一体，而在中东国家，“民族”与“国家”的融合尚遥遥无期，在这种背景下，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成为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强大反作用力。在已经建立民族国家的地方，民族主义表现为对“民族权利”和“民族利益”的坚决伸张和维护；在其他一些地方，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就成为民族主义的首要目标。

## 三、科普特人与埃及民族国家构建

如前所述，科普特人既是中东最大的基督教社团，也是埃及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因此，对埃及政府而言，如何正确处理与科普特人的关系是埃及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

### （一）科普特人与 1952 年革命前的埃及

在 1952 年埃及革命之前，尤其是在穆罕默德·阿里父子统治时期，科普特人开始享有伊斯兰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与穆斯林的关系也一度缓和，甚至出现了科普特人与穆斯林共同反抗英国殖民侵略的局面。在穆罕默德·阿里之子，赛义德·帕夏统治时期（1854~1863），埃及继续繁荣，他继续其父的世俗化政策，对科普特人来说，情形确实在改善，如 1855 年，一项针对非穆斯林的特别税 Jizyah 被取消，科普特人被允许进入军队服役，在

---

[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民族主义》，第 11 页。

很多领域，科普特人获得了与穆斯林相同的待遇。之后，科普特人和穆斯林联合起来，在扎格鲁尔的领导下组建了华夫脱党，共同反抗英国殖民入侵。

在穆罕默德·阿里王朝之后的岁月里，科普特人虽遭到英国人打压，但其社会处境尚未恶化。一直到 1952 年，科普特人在议会都拥有与其人口比例相称的席位，尤其在 20 世纪三十年代达到了顶点，虽然就纯粹数量来说，由于立法机构规模的扩大，1952 年科普特人在议会的数量较之前任何时期都要多。

表一：科普特人在埃及议会的席位及其所占比例：1924 ~ 1952

	科普特人席位	全部席位	所占比例
1924	11	122	9.1
1930	12	130	9.3
1931	15	100	15.0
1936	14	132	10.6
1939	19	147	13.0
1942	16	147	10.9
1944	15	147	10.2
1946	13	147	8.8
1950	13	147	8.8
1952	12	172	7.0

## （二）科普特人与1952年革命后的埃及

1952 年之后，科普特人在埃及的社会处境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参加七月革命的主要是穆斯林，另一方面则是受到革命后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的巨大影响。这使得科普特人在以后的岁月中，在政治上受到排斥、经济上受到限制、文化空间被压缩，在埃及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过程中被极大地边缘化。

Martyn Thomas, Adly A. Youssef, *Copts in Egypt: A Christian Minority Under Siege*, p.37.

Martyn Thomas, Adly A. Youssef, *Copts in Egypt: A Christian Minority Under Siege*, p.37.

Martyn Thomas, Adly A. Youssef, *Copts in Egypt: A Christian Minority Under Siege*, p.38.

Martyn Thomas, Adly A. Youssef, *Copts in Egypt: A Christian Minority Under Siege*, p.38.

首先，政治领域的边缘化。纳赛尔执政后，公开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强调埃及属于阿拉伯民族，在其执政时期，国家重要职位全部被阿拉伯穆斯林占据，科普特人的政治地位被极大弱化。1970年，纳赛尔去世，安瓦尔·萨达特继任，由于其偏好伊斯兰主义者的政策使科普特人感觉处境进一步恶化，实际上，萨达特利用伊斯兰主义者作为抗衡威胁其权力的左翼激进分子的工具。萨达特统治时期，科普特社团对自身处境的抗议仅仅引来萨达特的斥责，他警告科普特人停止介入政治，后来萨达特还逮捕了科普特大教长。穆巴拉克执政三十年间，科普特人甚至感到更脆弱无助，因为他们成为许多仇恨犯罪和恐怖袭击的目标。

表二：穆巴拉克时期科普特人在埃及社会生活的参与度

	穆斯林	科普特人
占总人口比例	80%	20%
建造宗教建筑的自由	100%	0%
各省省长	100%	0%
大学校长/学院院长	100%	0%
军警高官	100%	0%
报纸/杂志主编	100%	0%
内阁部长	97.75%	2.25%
驻外大使	99.6%	0.4%
议会成员	98.7%	1.3%
高等法院法官	99%	1%
军警院校学生	99%	1%

其次，经济领域被限制，科普特人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被边缘化还体现在经济方面。许多科普特人，尤其是生活在像开罗和亚历山大这样大都

Farrukh B. Hakeem, M.R. Haberfeld, Arvind Verma, *Policing Muslim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Context*, New York, Springer, 2012, p.104.

Molefi K. Asante, *Culture and Customs of Egypt*, Westport, Greenwood, 2002, p.74.

Farrukh B. Hakeem, M.R. Haberfeld, Arvind Verma, *Policing Muslim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Context*, p.104.

Martyn Thomas, Adly A. Youssef, *Copts in Egypt: A Christian Minority Under Siege*, p.31.

会的科普特人，在商业和政治方面一直很成功。但纳赛尔执政后推行的国有化政策对科普特人造成了重大影响，导致此后他们的经济活动被限制在私人领域。1952年，埃及革命成功后，军政权在1954年解散了所有政党，1952年颁布了农业改革法，1961年制定了国有化法案。

虽然 1952 年的埃及革命在社会福利和教育机会方面对科普特人和穆斯林一视同仁，但还是给科普特社团造成了不成比例的经济损失，由于远比穆斯林富裕，导致科普特人在纳赛尔的国有化政策中损失远大于穆斯林（约 75% 的工作和财富）。例如，在国有化以前，科普特人拥有埃及 75% 的交通运输业、44% 的工业、51% 的银行业和 34% 的农业土地。而在国有化运动以后，科普特人从这些行业被排挤了出去。

其三，文化空间被压缩。与政治、经济领域的压制相比，文化空间的被压缩对科普特人而言更具威胁，这种对科普特宗教文化的抑制表现在如下方面：一项源自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法令 Hatti Humayun，时至今日在埃及依然有效，该法案旨在限制科普特教堂的修建；在所有官方文件上必须注明自己的宗教信仰，包括大学入学和工作申请；所有教育项目和新闻媒体须用消极形象来形容基督教信仰；科普特历史在历史书籍上被移除。萨达特政权强化了对修建基督教堂的限制，这种做法可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穆巴拉克政权延续了这种镇压实践，将建造和修补基督教堂视为犯罪行为。

### （三）冲突漩涡中的科普特人与埃及民族国家构建

埃及政府的这些排斥和抑制政策加剧了宗教、民族矛盾，结果导致国内此类冲突绵延不绝，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使族群间的仇恨和隔阂越来越深，加大了民族和解的难度，迟滞了埃及民族国家构建的步伐。

首先，政府的偏袒政策与冲突的升级。自 1952 年以后，埃及国内对科普

---

William M. Habeeb, *The Middle East in Turmoil*, Santa Barbara, ABC-LIO, LLC, 2012, p.5.

Husain Kassim, *Islamicate Societies: A Case Study of Egypt and Muslim India: Modernization, Colonial Rule and the Aftermath*,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2, p.55.

Asef Bayat, *Life as Politics: How Ordinary People Change the Middle E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07.

Rachel Scott, *The Challenge of Political Islam: Non-Muslims and the Egypt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68.

Martyn Thomas, Adly A. Youssef, *Copts in Egypt: A Christian Minority Under Siege*, pp.33-34.

Martyn Thomas, Adly A. Youssef, *Copts in Egypt: A Christian Minority Under Siege*, p.41.

特人的袭击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上面提及的每一个案件中，埃及警察在预防和调查针对科普特人的袭击方面都表现得很无能，在很多情况下，警察甚至被指控是犯罪活动的同谋，因为他们要么是在所有的暴力活动结束后才抵达，或者是偏袒施暴者而不是受害者。

其次，极端伊斯兰主义者越来越多地把目标投向科普特人，造成针对科普特人的恐怖暴力活动不断升级。萨达特上台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一度放松了对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极端组织的管制，但这不仅导致其本人死于暗杀，同时也加剧了国内针对科普特人的暴力活动。随后的三十年中，科普特人与穆斯林的冲突断断续续地发生，这也反映了政府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关系状态，在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活动积极的时期，科普特人经常成为袭击目标，特别是在某些偏远的农村地区，科普特人与穆斯林毗邻而居，与城市相比，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管控薄弱，教堂尤其经常遭到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袭击。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科普特人的暴力袭击时有发生，九十年代初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团体向政府的宣战对科普特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的商店、住房和教堂成为许多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

自“阿拉伯之春”爆发，科普特人再次被卷入冲突漩涡，埃及国内极端主义分子针对科普特人的袭击大幅增加，科普特人继续扮演着埃及国内政治斗争受害者和矛盾转移渠道的角色。这既加深了科普特人与穆斯林的隔阂，又促使科普特人更加深刻地思索自身的前途命运，强化对本族群的认同，这些现象的反复出现和强度的螺旋升级，对埃及民族国家构建而言显然不是一个福音。

#### 四、中东民族国家构建中的失误与少数民族

二战后，中东国家相继获得独立，开始了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性进程，但令人失望的是，其进展十分缓慢，在某些时期甚至陷入停滞和倒退。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中东国家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上出现了很多失

---

Farrukh B. Hakeem, M.R. Haberfeld, Arvind Verma, *Policing Muslim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Context*, pp.104-105.

William M. Habeeb, *The Middle East in Turmoil*, 2012, p.5.

Farrukh B. Hakeem, M.R. Haberfeld, Arvind Verma, *Policing Muslim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Context*, New York, Springer, 2012, p.104.



误，从而引发了激烈的国内斗争，破坏了民族国家构建的基础。具体表现在：

### （一）排他性的民族主义

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是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大敌，因为它必然导致对少数民族集体权益的漠视和侵害，这种排他性往往在一种民族主义萌芽时就已出现，最终它会从自发走向自觉，从理论步入实践，成为中东民族国家构建失误的思想根源。虽然从原则上讲，在种族、宗教和其他身份认同及民族（national）身份认同之间没有冲突，但是假设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被界定为排他的或削弱其他的认同，就有可能引起冲突。

### （二）偏颇的主体民族主义和国族构建

偏颇的主体民族主义和国族构建，也即“民族构建”进程中的问题，是中东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的又一失误，它严重挤压了少数民族的政治空间，强化了他们的自我认同，甚至推动少数民族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化、暴力化，加大了族际政治整合的难度，造成中东国家民族构建进程长期停滞。二战后，对新生的中东国家而言，在主体民族主义旗帜下推进国族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国族对应着现代国家，推进国族建设无疑有助于现代国家构建，但受主体民族主义影响，很多中东国家选择将主体民族作为国族建设，忽视或故意否认多民族国家的属性，这种狭隘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也加深了他们的不满。

对中东民族国家构建来说，应在形成“政治民族”方面进行努力。具体来说，即赋予国内所有族群平等公民身份和集体政治经济权益、给予其应有的社会和文化活动空间，从而培养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构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从而形成“政治民族”，在其架构下，国内所有族群都是其一员，各族群只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而不存在政治上的区别。

### （三）激进的政策失误

除了民族构建方面的失误，中东地区在民族国家构建的另一个层面“国家构建问题”上也出现了诸多政策性失误，国家构建实际上是通过制度建设实现国家与市场、社会关系的合理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国家的角色应作为公正的裁判而存在，而不能扮演既是参与者又是仲裁者的双重角色，更不能对少数民族持歧视或敌视态度。而中东国家恰恰在这方面普遍出现了程度

---

[英]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著，刘泓、黄海慧译：《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5 页。

不同的政策性失误，从而严重影响了中东少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以阿拉伯国家为例，二战后，受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社会主义”浪潮在中东风靡一时，比如埃及的纳赛尔主义、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利比亚的“伊斯兰社会主义”、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兴社会主义”等等。

尽管中东国家所谓的“社会主义”在形式上差异很大，但在经济上他们都主张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实行土地改革和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等。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不同种族和阶层都在激进的国有化运动中遭受到某种程度的经济损失，但少数民族因其更富有而招致更多损失。以埃及为例，在1952年以后的埃及，科普特人损失了70%的财富和工作机会，从而使相当比例的科普特人陷入贫困。

#### （四）威权政治的作用

威权政治对中东民族国家构建也有着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威权政治极易向“强人统治”靠拢，从而演变成个人专权，由于权力缺少必要的制约，往往导致政策制定的随意化和执行过程的简单粗暴，侵害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其二，为巩固自己统治，威权政治之下的统治者有时还故意挑起族群矛盾以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在这种背景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经常性地成为这种政治伎俩的受害者。

## 五、结语

国家或主体民族之所以对少数民族持怀疑或敌视态度，原因有两方面：第一，少数者族裔成为不受欢迎的对象，因为他们不是多数者族裔，而多数者的认同（majority identity）正因为它存在的问题而变得重要了；第二，在人们普遍承认几个民族共同生活于同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地方，总有一些与自我管理相关的假设或推断，可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有限的自治主张，有一种组织成政治运动的自我统治要求，同时在既有权威中间也会有一些担心，害怕这些主张会构成对国家的威胁。但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事实上，族群间的和谐共处和各种文化的取长补短是一个国家进步的重要基础。列维—斯特

---

[英]斯蒂夫·芬顿著，劳焕强译：《族性》，第188-189页。

[英]斯蒂夫·芬顿著，劳焕强译：《族性》，第58页。

劳斯曾指出，“人类社会是否考虑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靠确定的多样性最佳选择来确定，超出这一最佳值，社会不能发展；而低于这一最佳值，社会的发展也不无风险”。

中东国家要实现真正的政治稳定和发展，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是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历史已经证明，在民族国家构建方面对待少数民族的失误对中东国家的全面进步产生了强大的反作用力，漠视这种问题的存在或继续坚持错误的做法只能使各族群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加大问题解决的难度。休·希顿—沃森就认为，人类文明的生存依赖于对两条真理的认同，其一，既不可能有绝对的国家主权，也不可能消灭民族属性，其二，民族文化与国家间合作必须保持平衡，更不用说一个民族内阶级利益和阶级合作应保持平衡。因而，对中东国家而言，公平公正地对待各个民族意义重大，用迈克尔·伊格纳捷夫的话来说，即“族群能肩并肩地和平生活的唯一保证是让他们效忠于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足够强大、公正、平等从而令他们服从”。

当然，少数民族也应该认识到，当今世界民族远多于国家，民族自决原则并不适合所有族群，期望每个民族都建立自己的国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在得到公平对待和拥有合理的政治经济文化空间的前提下，与国家领土内的其他族群和平共处、共存共荣是唯一现实的选择。尽管此前中东民族国家构建步履蹒跚，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民族国家构建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性进程，只要愿意改变就不算来得太晚。

---

[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著，于秀英译：《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 页。

[英]休·希顿—沃森著，吴洪英、黄群译：《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32-633 页。

[英]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著，刘泓、黄海慧译：《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第 174 页。

## Research on Ethnic Groups and Nation-State Building of Middle East Region

ZHANG Yanjun

(Zhang Yanjun, Ph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stitute, Xian Yang Normal College)

**Abstract** The ethnic and religion situation of Middle East is extremely complex, this results in there are a lot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How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with ethnic groups, which is a key factor that effects nation-state building of Middle East countries. This article is base on Coptic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evolve between ethnic groups and main nation, also includes the marginaliza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process that nation-state building, in addition, the policy shortcomings toward ethnic groups are also researched. In the author's opinion, equity of policy and policy execution is the only way that all ethnic groups realize co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Ethnic Groups; Middle East; Nation-State Building; Copts

(责任编辑：杨 阳)